

论和平、合作、发展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陈必达 刘胜湘

作者 陈必达,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武汉, 430072;
刘胜湘,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和平 合作 发展 有机整体

提要 谋求和平、合作与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形势的主流。和平、合作、发展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发展是核心, 是各国追求的根本目标。合作是途径, 是促进发展的最佳选择。和平是前提, 是实现合作、促进发展的首要条件。

目前, 如何认识国际环境, 构筑我国面向 21 世纪长期稳定的对外关系, 是一个十分紧迫和突出的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①这是对当今国际形势最高度的概括, 也是对我国处理国际事务、推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最深刻的说明。这一论述指出了和平、合作、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下面, 我们就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一具体论述。

一、发展是核心, 是各国追求的根本目标

发展, 是事物运动的一种必然趋势, 是宇宙间最普遍的现象, 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运行法则。在当今世界, 发展已成为内涵极其丰富、人们普遍关心的时代主题。在社会生活诸领域, 经济是基础, 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战后历史表明, 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已成为决定各种制度优胜劣汰的关键,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先进与落后的重要尺度, 并影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仅如此, 全球发展问题还直接关系到世界局势的稳定。“要么发展, 要么死亡”, 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信念和生存哲学。

(一) 经济发展问题决定两种根本制度的兴衰成败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理论强调指出, 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 是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 它关系到人类的发展前途。他说: “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②冷战结束之后, 发展问题更加突出, 各种制

度,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根本社会制度已不可能靠政治军事较量来决定胜负。国际间的竞争与竞赛的重点转向以发展科学技术、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谋求经济发展,在发展中争夺自己的有利地位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施塔德曾经这样说过:“在现代化的最初‘起飞’之后,经济领域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居首要地位,经济问题的解决,对于现代社会及其政治体制的存活与发展、保障现代化的延续、持续增长,以及任何制度领域的持续增长……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③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展,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原有的封闭的可以互不相关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对各国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了解越来越清楚,经济实力的雄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一种制度能得到人民信仰和拥护的重要方面。所以,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社会生产力不发展,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得不到充分巩固,就“只能是死路一条。”^④邓小平多次严肃指出,如果社会主义老是摆脱不了贫困,“它就站不住”^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大为增长,人民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们国家对各种风险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了。苏联的瓦解,则从反面教育和提醒了我们,如果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上也会出问题。

尽管在20世纪社会主义遭受到了重大挫折,出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像西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欢呼的那样:“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从地球上消失了”。苏联东欧的剧变,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失败,是旧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失败而决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的大失败。从全球走势来看,20世纪末期意义最重大、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与其说是以苏联东欧的剧变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失败,还不如说是新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体制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它预示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希望。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将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借鉴。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与壮大必将深深地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从资本主义国家情况来看,冷战后,各国均优先考虑本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一个国家能否保持政局的稳定,一个政党能否赢得选民的信任,主要看能否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并把经济搞上去。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执政多年的党派在大选中接连遭到失败,政府大换班,不能不说与执政党的经济方面政绩不佳、失掉民心有关。在争霸斗争中得分的美国布什政府,在海湾战争胜利后,却因选民对美国国内经济不满而被击败下台(1996年11月,克林顿又因经济复苏有功,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英国撒切尔夫人虽在当政期间制造了“撒切尔夫人奇迹”。但事过不久,英国经济又陷入严重的衰退,经济出现负增长,失业人数剧增,因而不得不挂冠而去。德国总理科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并继续组阁,恰是在德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之际。1996年3月澳大利亚大选,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反对党联盟战胜执政13年的工党,其主要原因是工党政策失误,经济发展并没有使一般民众从中获得多少实际益处。

(二) 发展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

过去,人们一说到安全,往往首先联想到军事问题。各国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现在看来,军事问题固然重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经济科技竞争上

升到主导地位，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外来的经济威胁成为许多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威胁，所以许多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战略。邓小平强调指出，如果经济不发展，国家的实力不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证。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一再表白，“我们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与经济紧密相连”，要“像激光束一样把焦点集中于经济问题”。“在对外政策中，经济也一样起着中心作用”。日本历来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并以此作为国家综合安全战略和争取政治大国地位的中心环节。西欧国家正在加深彼此的联合，并走向亚洲与美日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国内经济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上甚为落后的国家，能够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往往是经济上失败的最终结果。旧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落后就要挨打，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就受到百般的屈辱与歧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由此在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友好合作、协调世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全球事务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⑦。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它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同时中国又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第三世界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影响。美国政府认识到，敌视中国，最终可能会使美国比中国更加孤立，制裁中国，最终可能会使美国的经济损失更大。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必须和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交往与合作。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说，核心是经济建设，“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⑧。一些人提出“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其意图是要阻止中国的强大，然而中国的崛起和地位日益提高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三）经济发展将促进各国社会稳定和世界秩序的良性运行

发展与稳定是事物运动的两种不可分离的状态。由于发展具有前进和上升的本质，因而它是事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任何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稳定从来不是天赋的永恒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只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可能出现政通人和、社会稳定、国家强盛的局面；相反，生产力不发展，经济搞不上去，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发展、富裕、文明和稳定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停滞、贫穷、愚昧和动荡则总是结伴而生的。

针对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治安等不稳定现象，邓小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⑨他还提到，深圳改革开放后，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改善了。“民富则安”、“仓禀实而知礼节”，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人们的道德风尚也会不断提高。

西方国家也正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发达国家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平静

局面,主要是由于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兴办了许多福利项目,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劳动阶层的绝对贫困化比例降低和相对富裕人口扩大,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非洲一些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加上传统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未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严重,致使这些国家长期陷入贫困与动荡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另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实行改革开放,采取因地制宜的经济战略,促使经济持续增长,在较短时期内摆脱了贫困,社会由动荡趋于稳定。

各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为世界秩序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只要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不摆脱贫困,世界上就谈不上有真正的稳定。南北间的发展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恶化,成为政局不稳、社会动乱,以至军事冲突、局部战争的根源;并且,这种社会动荡和相互冲突,很容易会出现北方大国和周围邻国插手,使局面难以收拾。在战争灾难中出现的“难民潮”,会极大地冲击别的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国际社会秩序的急剧恶化。同时,由于各国注重经济的发展,加强经济安全战略,开展经济外交,经济的发展又使许多新兴强国不断涌现,世界走向多极化、均衡化。霸权主义越来越受到冲击,那种以控制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政治型国际关系向以独立自主、平等参与和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民主型国际关系转化,世界秩序由此得以进一步稳定。

二、合作是途径,是世界发展的道路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无法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与联系,它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走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道路。原因在于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的世界。由于战后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国际分工有了进一步发展,国家间经济依赖加强,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战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无不说明对外开放,寻求多方面、全方位的经济合作是最明智最有成效的决策,只有合作才能互补共荣,只有合作也才能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走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也只有合作才能在求同存异、共同开发中缓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减少和淡化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对抗,维持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保持双边与多边之间的友好关系。

(一) 通过合作,达到互补互利共同繁荣

1996年11月25日,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经济技术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将全体成员经济发展的多样性转化为互补性,实现共同发展。”^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1997年春节讲话中也指出,合作是繁荣的关键。

世界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具有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的生产要素,只有通过发展与其它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才有可能获得自己所不具备的或短缺的生产要素,才有可能将自己多余的占优势的生产要素转移到缺乏该生产要素的国家中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高、精、尖技

术密集型产品不断涌现。在科技研究和高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往往需要投入巨额资金，需要大量的复杂的技术，这常常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力量所办不到的，这就要求进行共同的投资和采用共同的技术，实现生产要素的集合。通过国际经济合作，一个国家可以较低的成本从其它地区获得本国需要但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从而产生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其成功经验表明，各国间不仅可以把各自具有优势的生产要素结合在一个实体中共同从事产品的生产，而且还可以在市场销售方面进行合作，共同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新产品，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与销售过程中的最佳市场容量有机地结合，从而大大促进了相互的经济发展。

（二）只有合作，世界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

人类今天面临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毒品泛滥、艾滋病、人口、粮食、恐怖主义、核扩散、种族与民族骚乱、宗教狂热等等。仅从环境问题而言，已经构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向前发展。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座谈会上提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①

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国界的，因此，需要各国协调行动。从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持续发展”问题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决定人类和地球前途与命运的是环境。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转变传统发展模式 and 生活方式，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重要成果《21世纪议程》是一份全人类环境与发展跨世纪的行动纲领。它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也为人们牢固地树立团结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

（三）经济合作是减少政治对抗、缓解紧张关系的调节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交往与合作。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大为加强，经济调节频繁；同时，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之上的经济联系的加强，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平等合作的可能性增强了。经济的合作在处理双边关系上也是一个共同的基础。正如美国学者彼得林所言，较密切的经济纽带，既是减轻政治紧张关系的动机，又是它的效果。政治关系的改善是改进经济关系的前提条件。经济纽带则可建立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它可以改善国际环境和使政治紧张呈螺旋形下降。

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它们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经济上的矛盾、摩擦竞争在日趋激烈，政治上也存在不少分歧。但另一方面，即政治上的结盟和经济上的合作仍然是主要的方面。日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比重很大，日美利害相关。因此日美关系在紧张一段之后又会出现松弛。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法国和德国两个经济大国的努力，而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积怨甚深。为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们放弃了旧有强权政治和不平等的原则，平等合作关系的建立使得欧共体得以发展成为联合程度最高的经济实体，走上了“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道路。中美之间经济上的互补共利，对两国经济发展和亚太经济的共同繁荣有重大作用，中美关系基于经济上的需要必然增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对维护亚太以至世界的稳定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强调指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

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⑩江泽民也多次提到,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美国决策者也一再表示,与一个强大、稳定、开放而繁荣的中国发展并保持建设性的关系,甚至是“伙伴关系”,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是有利于世界秩序稳定的。中日之间历史、政治上的矛盾和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争端也是造成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的原因,但中日经贸合作关系成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纽带和调节器。中日经济的有效合作必将成为带动亚洲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这对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也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三、和平是前提,是合作与发展的首要条件

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开展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谋求一个有利的持久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十分必要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没有世界和平,世界就不能发展;发展是和平的基础和动力,没有发展,世界和平就不能维持和巩固。因此,以和平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要求。战后世界经济的大发展是与长久的世界和平分不开的。冷战结束之后,各国注重发展经济,更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必须在和平环境下才能进行

邓小平指出:“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⑪。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去世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超越和平》也认为:“在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获得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逊是当今经济学界的泰斗,他认为下个世纪初世界经济将保持良好势头。除了亚洲仍然发展迅速,成了新的工业化地区外,俄罗斯和东欧经济将逐步复苏,非洲亦有可能步东亚的后尘,发达国家增长率有望提高。但是这一切取决于一个前提:保持世界和平的局面。

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在长期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下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使国家兴旺发达。只有世界全局或国家所在区域有一个相安无事的和平环境,人们才能够全力以赴地去发展经济,专心致志地从事建设。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即使是“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入侵,甚至是正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的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⑫

我们以亚太地区为例,冷战结束后,世界许多地区很不太平,而亚太地区却格外平静。与90年代缓慢增长的世界经济相比,亚太地区的高速增长尤为引人注目。1960年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4%,而今天已达到25%。近几年,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一直名列前茅。这几年来,发达大国纷纷把经济外交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这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是分不开的。

同时,也只有在国际和平环境下,才有可能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对外交往,实现经济合作。在冷战年代,各种制度的关系在政治上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在经济上构筑起两个平行市场。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冷战对峙状态。虽然国际形势总的发展趋势趋向缓和,但人们一直担心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会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和带来西方意识的渗透,所以始终紧闭国门,拒绝对外开放。结果作茧自

缚，自己削弱了自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世界阴云进一步消散，制度、意识形态之争淡化，经济发展与经济竞赛上升到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缓和，武力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作用日趋减弱，诉诸武力虽不可排除，其作用已大大降低。国际社会将放弃传统的“要么我吃掉你，要么你吃掉我”的法则，而走向一球两制、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健康之路。

（二）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集中资金加快发展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两极冷战尖锐对峙的格局下，苏美开展大规模军备竞赛，局部战争此伏彼起，自1960年以来，世界军费累计高达14万亿美元。扩军备战和战争，大量消耗了各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苏联军工生产的不断膨胀，成了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长期以来，苏联军工生产消耗掉巨额国民财富，不能回到扩大再生生产来的军工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苏联国民收入只为美国的一半左右，而据西方估计，其军费比美国还要多10—20%。苏联机器制造业产品中近半数直接、间接用于军需。这乃是苏联虽有庞大的机器制造业，但国民经济各部门设备陈旧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庞大的军工系统不仅是国民经济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而且也是苏联经济结构调整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阻碍。

近三年来，美国经济力量有所增强，长期以来美国经济实力削弱的趋势得到扭转，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日本和西欧。1995年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超过日本，居世界首位，1996年仍排名在前，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大国。这个新的转折的发生，与冷战结束有直接关系。美国已断然中止星球大战计划，把更多资金用来发展经济。

中国过去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峻，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将其绝对化，因此把主要的，或者说大部分精力都放在防范战争上去，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当今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得出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重要结论，实现了百万大裁军，削减了军费开支，实现了军转民的战略大转移，这也是多年来我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 释：

①⑩⑪ 《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1996年11月26日、7月17日。

②④⑥⑧⑨⑫⑬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370、371、265、91、332—333、82页。

③ 艾森施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8页。

⑤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240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页。

（责任编辑 叶娟丽）